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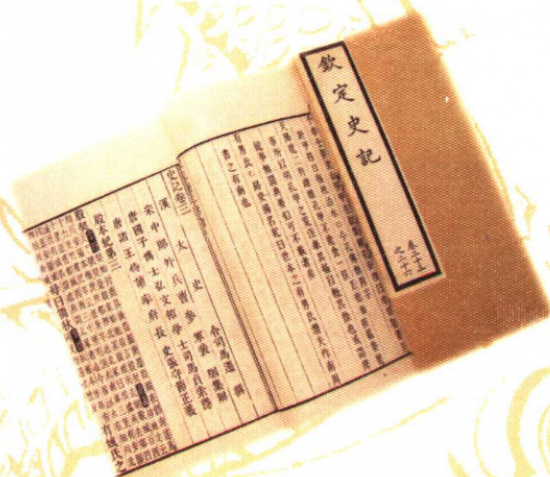
张岂之 主编 刘学智 副主编

中国

学术思想编年

秦汉卷

郑杰文 李 梅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岂之 主编 刘学智 副主编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

秦汉卷

郑杰文 李 梅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ZZ6N08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 秦汉卷/张岂之主编,郑洁文,李梅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

ISBN 7-5613-3488-5

I. 中... II. ①张...②郑...③李...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秦汉时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583 号

张岂之 主编 刘学智 副主编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秦汉卷
郑洁文 李 梅 著

责任编辑 侯晋公
责任校对 郭玉娥
装帧设计 吉人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2.625
插 页 4
字 数 498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7-5613-3488-5/B·107
定 价 全套(六册)240.00 元,本册 40.00 元

开户行:光大银行西安电子城支行 账号:0303080-00304001602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7864 85233753 85251046(传真)



秦汉学术思想史概述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正统学术文化的确立时期。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文帝、景帝时期的几番选择、尝试,至汉武帝时,终于确立了决定两千余年封建社会文化结构的正统学术文化思想系统。

一、秦代学术思想概论

秦王政依据河山之固的地理形势,和惠、襄几代的国力积蓄,用法家学说,尚耕战,挟术势,平灭关东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施政伊始,除继续用法家学说御民用臣外,还用阴阳家学说调整与前代王朝的关系,用神仙方术却病延年,形成了新的学术思想体系。

代前朝而承天命,是商汤、周武都曾用过的争取民心的方略。战国时期,阴阳家对这一学说系统整理并加以发展,形成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谓“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并排定了黄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所开朝代的所从德(见《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秦王政统一天下,称“始皇帝”,“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并以此改年始,定律历,行制度,数用六,尚黑色(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所采用的,是阴阳五行家邹衍派“五行相克”理论指导下的“五德终始”学说。

法家学说,在秦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曾起过重要作

用。故秦始皇治理一统天下，仍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制定严刑峻法以御臣民，“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从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墓竹简中，可知秦王朝法律条文之繁（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从戍边士卒“失期皆斩”（见《史记·陈涉世家》）等记述中，可见秦法之酷；从“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记·秦始皇本纪》）等记述中，可见秦法督察官吏之刻。另外，法家的重农尚耕思想仍继续贯彻执行，秦王朝建立不久，即“使黔首自实田”（《资治通鉴》卷七），从而将土地私有制推行到全国。所有这些，都是法家思想贯彻、指导的结果。

另外，作为战国“显学”之一的墨家学说中的某些部分，在秦代官方学术中也产生过影响。讲“天志”、“天命”以畏君，倡鬼神督察以儆民，本是墨家学说要义之一（见《墨子》之《天志》、《明鬼》），而秦王朝立国之初的“从德改制”以应天命，虽主要受阴阳家影响，但其中也不能说没有墨家“天志”观念影响的成分；而秦始皇的“时为微行以辟恶鬼”、谓“持璧遮使者”之物为“山鬼”（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等，虽或受方士蛊惑，或为诈造谶言者蒙蔽，但就秦始皇的灵魂深处来说，也是他没有抛却鬼神观念的桎梏所致。这些，都可看出墨家学说余绪对秦代官方学术思想和秦始皇本人的影响。

儒家学说在秦虽一度遭到厄运，但秦王朝建立之初，却并没有立即实施严酷的文化政策。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齐鲁，召当地儒生70余人，议封禅泰山之礼（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虽因诸儒生之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史记·封禅书》），但其所“绌”当系绌儒生之议，并未因此而罢用儒生，焚书前之廷争中有儒者淳于越等参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便可证明。即使在焚书坑儒后，儒士也并未被全部坑杀，也并未尽数驱逐，精通儒家礼仪的叔孙通仍在朝为博士（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儒

学也并未全部弃而不用,儒家祭名山大川诸礼仍在实行(见《史记·封禅书》);儒家思想影响仍存,秦始皇在死前的巡狩中,仍祭祀儒家理想中的圣王舜和禹(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诚如林剑鸣先生所说:“秦始皇坑杀儒生,并不等于摒弃儒学。他虽崇尚法家,但对于儒学中适合自己统治需要的部分还是极力提倡的。”^①诚然,秦始皇并没有对儒学深恶痛绝,他虽因公子扶苏对坑儒表示不满而谪他守边,但死前仍将皇位传于扶苏,便很可说明问题。综上所述,博士淳于越与丞相李斯的廷争,仅仅是儒家为政理论与法家治世学说的一次激烈交锋,只因李斯运用了“术、势”手法,将思想论争混同于政治斗争中,才导致了我国历史上政治对思想学术的首次强烈干预,促成了焚书事件;又因为方士与儒生阵线不明,才使得在坑杀事件中儒生连带受害。自此,儒家基本退出宫廷而散在民间,转入地下,但并未因此而成为绝学。孔鮒藏书以待求者(《资治通鉴》卷七),伏生藏《尚书》于壁中(《史记·儒林列传》),汉除“挟书律”后儒典辈出,都表明儒家典籍并非完全禁毁。视典籍如生命、以授徒为终身要职的儒生,是不会轻易放弃己学而退出社会运行系统的。

道家学说于秦代始终在民间传授。《史记·乐毅列传》载:“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载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瑕公、乐臣公乃乐毅之后。乐毅破齐后,因受燕惠王猜忌,故逃至赵,后代遂为赵用而居于赵。秦尽灭赵前,已于公元前 228 年破赵都,虏赵王

①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86 页注[30]。



迁。乐瑕公、乐臣公或于此时避难至齐高密。而此时下距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仅十余年，故《乐毅列传》所叙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正当秦王朝时。这当是道家学说在秦代传播仅见于记载的一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6年，秦曾改腊曰“嘉平”。据裴駰《集解》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系秦始皇闻民间流传茅盈成仙之歌谣中有“帝若学之腊嘉平”而改。虽不无传说色彩，但足可证道家学说在秦代传播非仅有乐瑕公一系。

除阴阳家学说外，在秦代得宠的还有神仙方士学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封禅泰山。后至琅邪，齐方士徐市上书言海外三神山及仙人不死药，引发了秦始皇的极大兴趣。自此至公元前210年崩于途，秦始皇曾二度亲巡海上，冀遇仙人得不死药。其间又遣徐市等齐方士、卢生等燕方士不断巡游海上求见仙人，寻不死药（见《史记·封禅书》）。秦始皇还以神仙方士说“微行避恶鬼”；甚至放下那自以“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自尊，称“真人”而不称“朕”。秦始皇在坑儒时虽曾连带坑杀一些方士（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但他始终对神仙方士学说笃信不疑，死前半年仍亲至海上寻仙人。二世初即位，即效其父东巡至碣石。可以说，神仙方士学说在秦代始终是幸运的。

神仙方士盛于燕齐之地。从地域学术文化角度言，始皇信从方士说游海上以求仙，是其所代表的秦代官方文化对旧有的燕齐文化的部分认同。另外，秦始皇感兴趣的旧有地域学术文化，除燕齐方士文化外，对楚越淫祀诸事亦颇有兴趣。他曾巡行至会稽；又曾至齐楚祀虞舜。从中可看出秦代的文化学术倾向：它袭用据之而富国强兵的法家学说，尚耕战，重赏罚，以法、术、势治理民与臣，调节人际关系；又取阴阳家“五德终始”说，借此“历运说”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以调节政治关系；还信从神仙方士学说，求仙求药冀得长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秦始皇调节天人关系的一种



手段。对于其他各家学说,合则取用,不合则罢斥甚至禁绝,焚其典籍乃至杀承传人。这成为秦代以政治统御学术的典型事例。

秦用法家学说,主要基于前朝经验之沿袭;排斥儒学乃至焚书坑儒,主要因儒家教化说与法家“刑罚治民说”冲突。事实证明,秦王朝没有处理好“马上得天下”与“马下治天下”的关系,没有抓住从战时社会机制到和平社会机制的“转型”,而死搬套用战时老臣(包括李斯)一意坚持的战时社会机制,使人民在战时紧绷的精神在和平时期亦见不到松弛少许的希望,故失却了民心而骤亡。

秦代以法家学说为主导的文化学术体制的形成,除了经验的沿袭外,还由于秦始皇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秦王政于10岁即位,18岁亲政,正值秦国力强盛。他挥戈东下,灭山东诸侯如破竹。这种异乎寻常的顺境,造就了他自视为古今第一帝王的孤傲性格。而他那随人质之父、艺妓之母流落他乡,受人侮辱的少年生活,又造就了他性格中的促狭一面。孤傲使他听不进反对意见,促狭使他对儒家德化学说有一种本能的抵触。这种复杂性格,在那个“予一人”的封建社会中,肯定会大大影响文化学术的潮流和发展方向。

秦代文化学术格局的形成,还与各学派的人格品行差异有关。诸子百家在秦代命运大乖者莫过于阴阳家与儒家。阴阳家学说之大受崇用,当与其“阿谀从世”的学术作风有关;而儒家讲“浩然之气”,一意为王者师的儒生,如淳于越之流,恪守“家法”“师法”学统,不能像汉代董仲舒那样应时而化,故不能为执政者所用,而遭到书被焚、人被坑的厄运。应时而化,随遇而变,是所有诸子各派学说得以流衍的主要条件。

二、西汉前期的黄老思想

公元前206年,刘邦借项羽与秦主力大战之机,绕路入关,与

秦民约法三章,收买关中民心;萧何收丞相、御史之律令、图书,刘邦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这些,都为刘邦建立关中基业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虽因项羽封刘邦为汉中王,刘邦不得不暂离关中,但不久即凭韩信之力还定关中,聚集各方力量,经4年鏖战而灭项羽,统一天下,建汉称帝。

得天下难,治天下更难。为巩固统治,汉高祖刘邦采取了如下措施:其一,令萧何删定秦律,作汉律九章以治民(《汉书·刑法志》)。其二,用儒士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而定汉朝仪以节制臣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其三,造舆论,借其碭山初起事时杀大蛇事,制造“赤帝子杀白帝子”的传言,与起兵时举赤旗相对照,借阴阳五行学说来争取儒者学士拥护。其四,定币制,改秦钱,减田租、轻赋税以发展经济。

采取此等措施的目的,在于争取民心士心,以巩固统治。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这些措施是从功利目的出发,对法家、儒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学说的灵活取用。在急于稳定社会、巩固统治的汉初,顺势而治,应民而动,成为统治阶级选取统治思想、制定统治措施的基本准则。秦代被钳制的诸子学说,至此获得重新发展的契机。

社会不但需要安定,更需要发展。经过秦代十余年苛法暴政,加之秦末汉初十余年战乱,此后的经济应如何发展,社会怎样才能恢复勃勃生机,是汉初统治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给这一难题做出初步答案的是齐相曹参。

曹参相齐,欲“安集百姓”,得胶西治黄老言之盖公。盖公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并推此理以言其他治理措施。曹参大喜,付诸实践,“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史记·曹相国世家》),以黄老清静之道治齐取得成功。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死,曹参继任为汉相,欲以治齐时的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故与惠帝约,遵从清静便民之术。结果全国大治。百姓歌曰:“萧何为



法，观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同上）张守节《正义》：“萧何作法和明，辅佐平直，载其清静治天下，使百姓归心，犹画一也。”萧何施政纲领，司马迁谓“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并记其因关中民少地，请允百姓入上林苑耕种隙地（《史记·萧相国世家》）；可见其基本精神与曹参治齐术同。经过秦代酷法和战争离乱的一代汉初政治家，皆以安定百姓、恢复生产为治道之要。

盖公之黄老术，《史记》仅留下“清静”二字，与《老子》“无为而治”略同。而黄帝思想学说，《汉书·艺文志》虽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然均久佚，今不得详解。马王堆帛书中整理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学界研究认为即黄帝学派著作。^①金春峰认为，《黄帝四经》的“核心是阴阳刑德思想”，它“全力研究的是国家的祸福、成败、兴亡、得失”，它“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反人文主义思想倾向，是《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的逻辑结论”。^②但丁原明最近却指出，《黄帝四经》代表了战国南方黄老学思想，稷下学术丛书《管子》中《心术》等四篇黄老学之作，则代表了战国北方黄老学的思想。^③那么盖公所传之黄老术，到底是属南方黄老呢，还是属北方黄老？

《史记·乐毅列传》载司马迁叙述盖公学术承传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

① 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5，第1期。

②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8～39页。

③ 丁原明：《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90～301页。



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据《史记·乐毅列传》，乐瑕公、乐臣公均乐毅族人，世居赵；秦灭赵，乐臣公避居齐之高密。毛翥公不知何处人。而嵇康《高士传》谓河上丈人即河上公，饶宗颐考与安丘丈人为一人。^①安丘在山东高密西，旧属琅邪。又《神仙传》谓“安期生者，琅邪阜乡人，卖药东海边”。此与《史记·封禅书》载海中有仙人曰安期生的传说相互参照，可知河上丈人、安期生应属中国北方东海滨人。可见自河上公至乐臣公，皆当在北方传承黄老学，应属北方黄老学派。故盖公所传当为北方黄老学。

北方黄老学孕育于齐稷下学宫，以《管子》之《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为理论代表。它接受了《老子》“道”为世界本源的哲学思想，并发挥为“精气”构成世界万物；它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发展为“君主清虚，臣下尽职”的统治权术；它继承了《老子》的“道”“德”说，把二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谓“道与德无间”，并将“德”发挥为“义、礼、法”（《心术上》）。这种学说，较之于帛书《黄帝四经》所代表的南方黄老学说，更加关注社会政治治理，从纯学术层面而进入政术领域，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故为曹参治齐所取。

以清静无为的道家学说为主，兼采义、礼、法等儒、法诸家学说以用于社会治理的北方黄老学说，是汉初政治思想的主流。同时流行的其他学说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如陆贾在汉高祖前时时称说《诗》、《书》，是一儒家形象；其所著言得失成败的《新语》，《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书“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为儒家书。但其《至德》篇所说“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

①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83页。



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却分明受黄老“清静无为”政治思想影响。再如文帝时的贾谊，有《新书》传世，或谓之儒家，或谓之法家。而其著《道术》篇则曰“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凡此皆为道也。”道本曰虚，是老子学说的主旨；讲制物之术，乃法家的应有之义。复如文、景时传《诗》之韩婴，虽为儒家经生，但其传世之《韩诗外传》却多有黄老思想内容。如卷二有“天无事也，犹之贵天也；……君无事焉，犹之尊君也；……故有道以御之，身居无能也，必使能者为己用也”。这与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和君静臣动的政术论说何其相似！

真正将黄老学说确立为政治统治指导思想的，是汉文帝。文帝以庶子藩王而至九五之尊，深知民间疾苦、民心所盼，故其先后除诽谤妖言法，除肉刑，减笞刑；又除田租；实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去繁礼”政策，因造露台需费百金而罢作；身体力行，贯彻黄老清静无为说，确定了文景时期任用黄老治术的基调。

三、汉武帝时期的儒学

儒家在政治上永远不甘寂寞。秦始皇坑儒后，仍有一批儒生如叔孙通、孔鲋等活跃在社会上。秦末战乱中，孔鲋投效陈涉而死，叔孙通依附刘邦而兴。汉立，叔孙通为刘邦定朝仪，作《仪品》，制庙乐，受封为太常，后为太傅（《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及《汉书·礼乐志》），是汉代儒生中第一个得重用的人物。

为巩固统治，刘邦直至文帝、景帝，实际上都在实行兼取百家之长的政策，兴礼作乐用儒家，清静治民用黄老，作律定法用法家，定服色律历用阴阳五行家，诸子各家都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儒家经典也通过记忆口授或出土整理而渐次复兴。齐人田何传《易》，陆贾颂《诗》、《书》，申培传《鲁诗》，济南伏生传《尚书》，鲁高堂生传

《士礼》，河间人颜贞献《孝经》，张苍传《左传》于贾谊，胡毋生授《春秋》于公孙弘。儒家经典，一时大出。文翁兴学于蜀，以儒学教化（《汉书·循吏传》）。这些，都成为儒学独盛的先导。

但是，汉初儒学，基本止于学术层面。它欲成为统治王朝的主导学术思想，还面临着自身学说的改造问题。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景帝时河间儒生董仲舒。

景帝时，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董仲舒为公羊学博士，在对河间献王问时，阐发了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春秋繁露·五行对》载：“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王曰：‘善哉。天经既得闻之矣，愿闻地之义。’对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王曰：‘善哉。’”此种解释，将儒家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忠、孝观念，通过“天之经”、“地之义”与阴阳家的五行四时学说联系起来，打通了社会政治范畴的忠孝与自然界天长地养规律间的联系，表现出董仲舒新儒学“天人相应”基

本观念的建立,标志着对先秦儒学改造的完成。

先秦儒学改造的完成,是汉代独尊儒术的基本条件;而统治阶级的取用,才是儒术独尊的决定性条件。应该说,起儒生,用儒学,从汉景帝时就开始了。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立太子,以《鲁诗》传人王臧为少傅,又以《齐诗》奠基人轅固为清河王太傅,以《韩诗》奠基人韩婴为常山王太傅,在太子、藩王择师方面做如此苦心安排。发展到后来,竟在朝廷、宫廷内出现儒学与黄老学的直接斗争。景帝中元年间,轅固、董仲舒与“好黄老术”之黄生在朝廷上公开争论“汤武受命”(《史记·儒林列传》);景帝纵容轅固在倡黄老言的窦太后前斥《老子》为“家人言”,窦太后怒而令刺豕,景帝助轅固以利刃而免难(《史记·儒林列传》);凡此种种,都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政治基础。

曾以儒生王臧为少傅的太子刘彻喜好儒学。其即位初年,即起用儒生赵绾、王臧等为公卿,又欲“立明堂城南”;又迎立赵绾之师申公与俱好儒术之重臣窦婴、田蚡,又征用治《春秋》之公孙弘为博士,复起用轅固为贤良(《史记·孝武本纪》)。但不到一年,即遭窦太后反击,罢赵绾、王臧之用而使其下狱死,去窦婴、田蚡丞相、太尉之职。好黄老的窦太后不容许儒学从学术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与黄老学争宠。武帝并没因此而泄气,等事端稍平,遂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立五经博士。等建元六年窦太后卒,马上起用儒生百余人,重任田蚡为相,复用公孙弘。建元七年,举孝廉,召大儒董仲舒对策。武帝承景帝心愿,独尊儒术,奠定了二千余年封建统治的主导学术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先秦儒学的基本社会政治理念基础上,发展了旧有的“《春秋》灾异说”,融合阴阳五行家的阴阳、四时、五行学说,承袭了公羊学说的一统理论,借用了墨家的“天志”信仰形式,建立起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天人感应为基本理念的

新儒学框架。它以先秦儒学中的仁义学说解释天地之性,以阴阳灾异等自然现象附会天人关系,以天高地卑等自然属性比附人际关系,以四时替代等自然法则比说统治方略,以五行顺逆比说王朝运历,以天广地厚解说“大一统”之义。其中,从天地之道推衍出的“大一统论”是其学说核心,为天子独尊以统治天下,制造了天经地义的社会舆论;天人感应是其学说要义,表现出“天志”对皇权的制约,和对社会事务的干预和指导;从大一统论推衍出的独尊儒术说,是其学说推行的理论保障和政治措施。这样,董仲舒的新儒学便成为贯通“天人之际”、规范“人人之间”的,将自然规律和社会理论融为一体的,包罗哲学、政治、学术思想的新理论学说。

以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汉武帝进行推恩削藩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解决西汉前期久乱不治的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矛盾;重用公孙弘、桑弘羊实行官盐铁的国家一统经济体制改革,为控制地方、征讨四夷积累了物质财富。至此,在学术思想、统治体制、国家经济等方面,都出现了汉代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

汉武帝在推恩削藩、限制地方武装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取缔了几个久与中央抗衡的地方学术中心。汉初分封的几个疆土较大的同姓王,借助较强的经济实力,聚养了一批文人学士,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地方学术中心,如梁国文学中心、淮南道家学术中心、河间儒学中心等。河间献王刘德于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在位26年,曾立《毛诗》、《左传》博士;又曾得古文《礼》56篇、《礼记》百131篇、《周礼》6篇(见郑玄《六艺论》)、《孝经》,并作《乐记》(见戴震《戴东原集·河间献王传经考》)。汉武帝通过令其献书等方式,把这些学术逐步集中到中央(见《汉书·景十三王传》等)。淮南王刘安,文帝时受封,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谋反被诛。刘安好读书,喜音乐,工辞赋,聚集了一批文学之士;又好黄老道家,喜神仙方术,燕齐方士多汇聚于此,曾作《淮南

子》内、外、杂篇，言道家学术、神仙方术、黄白铸造等。武帝诛刘安，以武力铲除了这一与中央尊儒政策异途的学术中心。

于是，汉武帝在统一全国政治、经济的同时，也铲灭了地方学术势力，实现了学术一统。只是与独尊儒术的一统学术局面不相称的，是武帝对神仙方术的偏好。战国中后期兴起的燕齐方术之学，曾蛊惑过秦始皇。自汉武帝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年—公元前129年）起，方士李少君、栾大、公孙卿等相继贵盛。武帝发千人至东海上寻仙药，造楼台候神人，游东海求仙人，数度被欺而不悟，直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从田千秋谏而罢。

武帝雄心勃勃，好大喜功，欲有一番作为，因而选择了以维护中央集权的思想控制为核心的、经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作为主导学术思想；在加强政治统治和经济控制的同时，一统天下学术，而独容许神仙方士学说存在。个中原因，首先是人与天地同寿的神仙学说，及欲嫁接自然物体永固性于人身的神仙方术，与董仲舒新儒学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相吻合；其次，以实用为目的而选取思想、方略是汉高祖开创的汉代统治措施，武帝欲有一番作为，故从董仲舒新儒学而一统天下，欲长生久视以享永祚，故从神仙方士说而求长生。

四、汉代的谶纬学说

汉武帝之后，西汉王朝由盛转衰。最后，王莽篡汉自立。新莽王朝只存在了15年，便由刘秀在群雄争斗中夺得皇位，应了流行于关中的“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的《赤伏符》谶言。

谶言是一种神秘的预言，相传起于姜尚（见《论衡·纪妖》及《语增》）。秦始皇时有《策图书》，上载“亡秦者胡也”；更有民间谶言曰“今年祖龙死”（《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武帝时，公孙

卿奏其师申公讖言以媚上(见《史记·封禅书》)。西汉后期,方士甘忠可、夏贺良有讖言专书藏于兰台(见《汉书·王莽传》)。两汉之际,讖言更盛。王莽以“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等讖言夺权(同上);而刘歆亦曾以西门君惠所传讖言欲谋反(同上)。讖言本是一种与社会政治紧密关联的古老巫术,后被方士接受、改造为干政方术之一,并于汉代政治斗争中,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下获得了大发展。

讖言是为某时的政治需要诈造的,在流传时让愚昧的百姓相信颇易,而让有头脑的读书人信奉颇难。所以王莽在即位称帝的当年,即组织一批人作《符命》42篇,传布天下,宣扬德祥、符命、福应。同时,以神秘数术、诈造的讖言和符应以及荒谬的“感生说”等,去附会在知识士子中广为流传的儒经,造作纬书。

纬书的产生年代,研究界多以产生于哀平后^①。由《汉书·艺文志》著录方士神仙杂占风水等著作却无一纬书见,纬书确是刘向、刘歆校书后才产生的。那些对社会政治本来就紧密关注的经生们,看到平民无赖因造讖言而显贵,当然要仿效之来解说经文,以此取宠。王莽篡汉位当年即造出四十二篇《符命》,没有经生参与是不可能的。而在内容学说和对历史、社会现象的阐释方式上,《符命》与纬书又惊人地相似。又,刘秀藉以起事之讖当见于《河图赤伏符》、《河图合古篇》、《河图会昌符》等,公孙述藉以称帝之讖言见于《河图录运法》、《河图括地象》、《孝经援神契》等。再,新莽时桓谭曰“今诸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讖记”(《后汉书·桓谭传》),而张衡亦曰讖纬于“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后汉

①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117页;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17~226页;钟肇鹏:《讖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21~26页。